



王曾瑜
著

潘家园书声



YZLI 0890092154

北方文艺出版社

王曾瑜 著

书
声

潘家园书声



书



YZLI 0890092154

北方文艺出版社

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潘家园书声 / 王曾瑜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12

(书声·书声)

ISBN 978-7-5317-2542-8

I. ①潘…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宋代 IV. ①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9262号

潘家园书声

作者 / 王曾瑜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装帧设计 / 安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址 / <http://www.bfwy.com>

邮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哈尔滨群鑫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20×1020 1/16

印张 / 15.5

字数 / 220千

版次 /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8.80 元

书号 / ISBN 978-7-5317-2542-8

《书声！书声！》文丛序

王春瑜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在银幕上再现，一个个悲惨的镜头，让我们的心头滴血。《南京！南京！》的二个惊叹号，分明象征着警世钟，紧迫地告诫国人，毋忘国耻！振兴中华！我替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的这套读书随笔文丛，起名《书声！书声！》，决非跟在陆川身后“东施笑颦”，而是受其启发，在“书声”后加上惊叹号，旨在警示国人，大力提倡读书，是到了确有紧迫感的时候了！

谁能说得清当下有多少农村儿童失学？多少农村小学关门？以我的切身经历来说吧。1942年，我虚岁六岁，在江苏建阳县（今建湖县）蒋王小学上学。这是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创办的新式小学。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小学，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并有英才出现。但我三年前返乡，这所学校已关门大吉，宽敞的校舍，成了祭祖的场所。如果列祖列宗地下有知，当为子孙的失学而“长太息以掩涕兮”，无可奈何。我家曾请过几位小保姆，都很聪明，却因家贫而早早退学。第一个小保姆只读到初小四年级，我问她知道周恩来、朱德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妻叹息着说：“这简直是新一代愚民。”另一位小保姆，读完高小，算术、语文、美术的成绩都很好，但未学过地理，一次问我：“伯伯，上海是不是在内蒙古呀？”我忍不住捧腹大

笑，夸她真有想象力。其实，这样的女孩，国中又何止成千上万！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大量的学校不断关门，大量的儿童不断失学，如果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发展下去，我们的民族总有一天必遭报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可以断言的！

文坛耆宿吴江先生已年逾九十，去年书一联语赠我：“人生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何其有味也！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提倡读书的传统。在农业社会，“渔、樵、耕、读”，是家家户户遵奉的信条。即使在工业文明昌盛的当代，这一传统并未断绝，石在，火种就在，读书的种子始终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天寒地冻、狂风暴雨，都不能摧垮它。非典肆虐的那年，我在京中谈非典色变、形势严峻的日子里，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仍有几百位读者在买书、看书；在三联韬奋中心，也看到有几十位读者在买书、看书，而且其中还有几位小朋友。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作为一个学者、作家，还有什么情景，比看到在如此严酷的日子里，读书人仍痴心不改，更让我感动呢！我认为，当今世风浇漓，浅薄浮躁，日甚一日，读书的形势相当严峻。但是，悲观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我们要不断为提倡读书鼓与呼，编这套读书文丛，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加入本文丛的作者，有学者、编审、评论家、作家，虽然岗位不同，但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手不释卷的饱学之士，而且都是思想者。显然，他们的作品，是值得读者认真一读的。

2010年8月24日下午于老牛堂

Contents

—— · 目 录 · ——

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77
北宋从腐败走向灭亡	80
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85
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	91
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94
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99
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103
岳飞事迹杂谈	107
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和岳母刺字的传说	112
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	117
文天祥的家族	122
李清照和秦桧、王继先	128
李清照与赵明诚	131
从《汉武帝》谈古代若干名物及其变化	134
从《汉武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	138
中国古代的煤、石油和天然气	147
宋代的绿色革命	153
珍珠小史	157
袜的故事	162
金鱼的故事	165
书同文和标准话	170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177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187
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言》和《二拍》	206

忆黎澍先生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自愿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异化”为身份问题，这当然是荒谬的。例如在文革前，辈分较低的，如黎澍先生等人，官方宣传就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似乎资历还不够格。然而这个名词如今又被滥用，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指鹿为马者，也被冠以此种看来似乎是崇高的称号。

黎澍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专家，曾著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的。如今看来，黎澍先生当然也是有过失的，例如他曾批判尚钺先生为史界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帽子。但黎澍先生的史观真正发生改变，则是在文革之后，并且也尽力更正过去的错误。他那部《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就记录了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深入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¹“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²记得在我们学生时代，不知给我们这些学子进行了多少必然性的教育。然而当中华民族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两次奇灾惨祸之后，痛定思痛，这两次大事件是何缘由，有何必然性？这当然是每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正视而回答的问题，而不应回避的问

1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题。黎澍先生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的第一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¹但是，经过两次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以后，毕竟是有一批共产党人，开始识破庐山真面目。如周扬先生过去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很多人挨整，由他出面的。如今方知，当年从局外人看来，他似乎是“左”的，但在中宣部内部，他却是“右”的，但许多“左”的动作，还须由他出面。文革结束后，周扬先生确是觉悟的一人，据说每次见到过去挨整的人，总是主动向人赔罪和道歉。他提出所谓“异化”的理论问题，据有的记载披露，是有感于本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却成了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我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周扬，倒不必提什么同化或异化，就是提巴黎公社原则，提批判等级授职制，提马克思主义强调直接选举制，看看那些“理论家”如何批老祖宗。

黎澍先生当然是看穿庐山真面目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对于所谓“四人帮”的本质，最初华国锋提出的官方口径是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而黎澍先生却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的《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雄文首先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后又编入《再思集》。此文指出，江青之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篡党夺权，建立‘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预告篡党夺权成功还要杀人，并且要不断杀人，反复杀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酷嗜杀人的狰狞面目”。

“他们颂扬暴政，攻击仁政，原来是一码事。他们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侈生活的驯服工具”。他在另一篇《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中说，“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忽视这个条件，反动阶级的复辟将随时在各个领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1 《东坡七集·东坡集》卷13《题西林壁》。

在整个过程中不再出现复辟倒退的曲折”，“除了进行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我们急需制订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监督、各级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制度、干部制度、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自外于法律，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上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成了封建国家、法西斯国家”。“我们一定要处处警惕数千年封建传统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坚决加以排除，对于封建专制的任何变相复辟的表现，即使是局部的，也必须公开揭发和批判”。

黎澍先生以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入思考，以雄大的气魄，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提出了必须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挖掘出了十年浩劫等奇灾惨祸的病根。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没有彻底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提不出这个科学结论的。那些蝇营狗苟的所谓理论家，那些曲学阿世的所谓学者，既不可能有此责任感，更不可能有此科学勇气。当时，此文的发表真是石破而天惊，对陷入苦苦思索的我，确是起着茅塞顿开、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作用。

黎澍先生曾在《新华日报》工作过，他有时说，自己是搞新闻出身。他主要研究近代史，就国学和中国古史的根基而论，当然比不上范文澜等先生。但是，提出重新批判专制主义的问题，是黎澍先生对中国史学，也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这是范文澜等先生未能做到的。至于活到文革结束后的郭沫若先生，其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也根本无法与黎澍先生相比。¹我想，中国史学界、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忘记黎澍先生的贡献的。黎澍先生打开了中国史学重新批判专制主义之门，是一位勇敢的开门手。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当然是史学的一种重要功能，而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如果要投票选举中国大陆史学六十年的第一人，我想，我一定会投黎

¹ 关于个人对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参见拙作《〈凝意斋集〉自序》，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又载《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澍先生一票。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了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研究领域，或者说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我认真考虑过，六十年间，确有一批学识渊博，在断代史和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史学大家。请注意，我避免使用“大师”一词。关于“大师”，我在《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自己的看法，¹兹不重复。至少在当时，大师兄漆侠先生就表示同意我关于“大师”之说。但平心而论，也确实并无另一位史学大家，是开创了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然而黎澍先生开创的新路，说小了对中华史学，说大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都至关重要。

有人企图将他打开的大门重新关上，但黎澍先生身后二十余年的史实证明，这扇大门是关不上的。例如周良霄、刘泽华、王春瑜，还有不久前逝世的韦庆远等先生，仍步着黎澍先生的后尘，从事此项令某些人厌恶的工作。人有时就是想不开，他们辛辛苦苦工作，又是图个什么？但总不是为了自己鼻子尖的蝇头小利，想捞一把吧。

我在黎澍先生的启发和影响下，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一文，但因当时的环境，删削了此文最后一节，后在《凝意斋集》发表时，改标题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最后一节有如下一段话：“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不搞思想解放，不搞反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划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说，思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终止的，黎澍先生打开的中国史学重新批

1 原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又见拙作《丝毫编》第600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判专制主义之门，必然是愈开愈大。中华民族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批判中华专制主义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是绕不开的。

但是，由于黎澍先生提出了这么一个事关中华民族进步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也必然令某些人厌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而最终的解决方式是以“退休”的名义革职。耐人寻味的是，对周扬先生的“异化”论公开进行“温和的”口诛笔伐，当然也不容周扬先生答辩；而对黎澍先生的反专制论，却是不动声色地组织处理，从不作公开批判。可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然，真理愈辩愈明，应是人们的常识。

文革前，我也听过黎澍先生若干报告，但印象不深。只是听说，他一到近代史所，就批评近代史所全所人员只是为刘大年一人服务的情况不对，应当人才辈出。真正对他有个别接触，还是在文革后期，记得我们还在明港军营，当时周远廉先生和我一起奉命，向黎澍先生调查尹达先生。此次黎澍先生给了我很深的好感和印象，他为人爽直，说话干脆，相形之下，接触更多的尹达先生，有时说话吞吞吐吐。特别在江青等人倒台后，黎澍先生也算是复职并升迁，但他对人，特别对后辈丝毫没有架子，真诚而坦率。我对熊德基先生说，像黎澍那样，我作为后辈，即使同他吵架也没有关系，他决不会记仇，或者认为我对他不尊敬。熊德基先生说，对了，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退休”之后，我仍是常去他家。当时没有电话，从无事前告知的可能，但他大致上闲在家里，往往总能见到他。我当时还在走学究式的道路，所以从不问他“退休”的内情。如今回想起来，我们的多次会面，都对当时愈来愈严重的腐败发牢骚，但又苦于无奈。他辞世的消息，我很晚得知，连他的追悼会也未能参加，这是一大遗憾。但时隔二十余年，我确实忘不了黎澍先生，并且愈来愈强烈地怀念他。

黎澍先生和胡绳、刘大年先生在文革前，给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印象，都是党的近代史专家，在文革中，也都蒙受不应有的冲击和批斗。但正是从文革后期始，却各自走完了迥异的人生旅程。我手头有一本中国社会科

学院科研局编的《学术大师治学录》，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其中介绍胡绳和刘大年，甚至也还介绍周扬先生，却没有黎澍先生的一席之地。书中称胡绳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说刘大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关于刘大年自文革后期开始的表演，我在《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一些思考》¹一文中已作介绍，不必赘言。这些是上年纪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众所周知的事，因为我与刘大年没有任何私交，不可能有他人所不知的秘闻。在此也不可能对胡绳先生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学问有完整的评论，只须指出众所周知者，其实，对中华民族而言，做开国功臣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式的史学家，确实是少一个，好一个。中华民族真正需要的，正是如黎澍、漆侠、胡如雷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信仰的史学家。

记得在文革结束后，我对一位师姐说，黎澍和刘大年过去在我们眼里似乎没有差别，现在才看出来，两人高下差别颇大，那位师姐表示同意我的说法。然而刘大年最终授人大常委委员等职，胡绳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与黎澍先生相比，当然是荣枯有别。若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荣枯有别的偶然性中，自然是有着必然性。此种必然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必然起着作用，学者中效法刘大年者不少，而愿意当黎澍先生后继者寥寥可数，但毕竟还是有人。还有不少人，似乎是走着既不同于黎澍先生，也不同于刘大年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也自我感觉良好。人生本来是个万花筒，各人有各人的选择，不可相强。

日月如梭，转瞬之间，黎澍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谨以此文，作为对这位尊敬的长者的菲薄纪念。

1 《历史学家茶座》2009 年第 4 辑。

忧国忧民启深思

——读《中国反贪史》有感

贪污腐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大毒瘤，引起上自广大社会主人，下至各级公仆的高度关注。一些身居中央工作岗位的公仆也屡次指出，贪污腐败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在此情势下，《中国反贪史》的写作和出版，是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家作主的广大社会主人的迫切需要。当然，也许也有不喜欢或讨厌的，他们只能是贪官污吏。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大的争论命题，其中涵盖了相当广泛和复杂的内容，在此不必论述。应当指出，义利之争其实仍然延续到今天。面对着社会的变迁，知识分子们对世道的透视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各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道路，却是五光十色。曲学阿世之士，也许他们口头上并非不能冠冕堂皇地说一通，也能对腐败发一点有限度、有节制的牢骚，但在骨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无非是抓住机遇，浑水摸鱼，参与一些分享实惠的腐败，以捞取多多益善的实惠，为最高理想。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利的一边。但是，中华自古以来，也从来不乏见义勇为、慷慨许国之士。如陆游传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杜门忧国复忧民”¹的不朽诗句，顾炎武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呐喊。这些名言长久地震撼着我们民族的心灵，激励着后人。在没有任何的课题费、出版基金等资助下，《中国反贪史》的作者王春瑜（主编）、王贵民、孟祥才、范学辉、宋艳萍、刘精诚、房晓军、李敬洵、张全明、邱树森、南炳文、张献忠、张前进、卢经和邱涛先生，全凭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不长的时间完成这部开创性的作品，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和编审汪灏先生又是不计成本，将此书作为精

1 《剑南诗稿》卷7《病起书怀》（其一），卷70《春晚即事》（其三）。

品，精心编辑和组织出版，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在某些聪明人看来，他们当然是傻瓜无疑。然而在新的一轮义利之争中，他们是站在义的一边。

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后记中，引用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用以形容自己是以“一介草民”的身份，却与同道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笔者读到此段时，不由自主地反复咀嚼起来，既颇感耐人寻味，却又很不是滋味。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立的新社会，应与古代的专制社会有本质差别，依照巴黎公社的神圣原则，我们才是社会主人。如果说古代的孟子早已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¹的先进思想，时至今日，任何社会主人就更应当居于任何社会公仆之上，行使他们直接选举、监督、弹劾和罢免任何社会公仆的权利，惩处任何贪官污吏的权利，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笔者想来想去，最好还是以社会主人一员的资格，向一群从事《中国反贪史》工作的社会主人，表示自己的敬意，方为得体，方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纲常。

万事开头难，从史学的专业角度看，要在原先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前提下，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和写作，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一部贯通先秦至清的反贪通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反贪史》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初步梳理中华数千年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轮廓和脉络，论述了历史上的不少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某些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规律，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而各个断代的论述又各有特色。例如先秦部分在十分单薄的史料中，钩沉索隐，居然自成体系，已是十分不易，而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特别反映了王贵民先生治学的严谨。宋代部分的体例和目录编排，即反映了张全明先生的卓越史识。笔者与张先生是宋史界同行，但扪心自问，如果要叫笔者勉强设计一个宋代反贪史的体例和目录，其水平肯定是在张先生之下。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和后记，以及各个断代论述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议论，都足以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1 《孟子·尽心下》。

世上可以有精美绝伦的小诗和短文，却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长篇著作。特别是《中国反贪史》作为一部开创之作，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笔者愿意提出几点，作为献芹之意，未必妥当，仅供作者们参考。

关于直言敢谏的问题，《反贪史》中有所论述，但似乎仍嫌单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直言作为维系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公德的重要支柱，对腐败丑恶现象的重要震慑力量。欢迎和容纳直言是治世的标尺，贞观之治所以作为古代治世的楷模，正在于唐太宗对直言的鲜明态度，正如杜甫所歌颂的，“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¹反之，直言贾祸，文字狱如麻，又是衰世的表征。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²直言兴邦，谏词祸国，永远警钟长鸣。

关于风闻言事的问题，《反贪史》缺乏论述。据宋人笔记《容斋四笔》卷11《御史风闻》、《寓简》卷5等，允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大致起源于南朝，这是古人反腐的一项宝贵的经验。很多埋藏颇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而处以诬告等罪，就等于杜绝了纠劾之路。必须实行风闻言事，即允许公开揭发，而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也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此外，古代的某些防腐人事制度，如亲属等人的回避制度，保举、任用下级不当的处分制度，下级出问题而失于觉察的处分制度等，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反贪史》的某些章节或缺乏论述，或论述不够充分。针对今天的反腐现实需要，此类制度完全有必要制订为适用于各级公仆的专法。

总的说来，《反贪史》主要是从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角度，给今人以启迪。从坏的方面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遗传基因。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部分最高的、最重要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基本条件。

1 《全唐诗》卷225《行次昭陵》。

2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在此条件下开展的反腐斗争，只能是打死几只苍蝇，而老虎屁股摸不得。清官固然可敬，但清官决不能根治腐败，一切有识之士为阐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费了多少笔墨。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长期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岂不是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

我们国家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依我个人学习的体会，在马列主义的丰富学说中，对今日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最强的、指导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巴黎公社原则。巴黎公社原则只有简单的两条：一是任何公仆只能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工人工资原则；二是任何公仆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被直选者罢免，而反对等级授职制，“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看似简单的两条，对腐败问题是可以收到犁庭扫穴之效的。用先进的思想指导反腐，除了巴黎公社原则外，我真想不出还有更高明、更先进的指导思想。老祖宗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够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受用的。王春瑜先生强烈呼吁反腐走出轮回，笔者以为，我们也只能在巴黎公社原则的指导下，方得以走出轮回。